城市的垂直流动：广州再领域化中的人地关系重构

陈浩然 安 宁 朱 竑

【摘 要】流动性重塑了人地关系，地的再领域化过程可以视为一种跨阶层的垂直流动。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原有的城市行政结构体系。撤县设区是典型的城市的垂直流动过程。在这过程中，县城本地居民的身份政治，以及他们与县城、新城之间的关系亦随之改变。以广州为例，通过研究撤县设区中本地居民与领域空间的关系重构，进而探讨流动性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化。研究发现：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其身份政治在再领域化的过程中，从旧领域的多数群体转变为新领域的少数群体。这种转变导致本地居民排他策略的形成，并由此形成了新领域中的一个抵抗空间，重构了本地居民、旧领域和新领域之间的人地关系。研究城市的再领域化过程是对地理学探讨流动性的有效补充，有利于从地的视角更深入理解流动性的影响及意义。

【关 键 词】流动性；人地关系；再领域化；撤县设区；广州

【作者简介】陈浩然(1994-)，男，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研究，E-mail: chanhoyin@163.com，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城市与移民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安宁，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城市与移民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朱竑(通讯作者)，E-mail: zhuhong@gzhu.edu.cn，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城市与移民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原文出处】《地理科学》(长春)，2020.10.1627～163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30635，41701149，41971183，41901170)、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2018B030312004)资助。

20世纪末，地理学遭遇交通及通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流动性之挑战，甚至因此被质疑“地理终结(the end of geography)”[1]。随后，尽管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个体的流动性研究，或是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及其影响[2]，但始终存在一个“地方自身并不会流动”的隐患。然则，这种对于流动的观点依然局限在物理空间的位移，忽略了隐藏在不同阶层之中的垂直流动。地方也是权力生产的空间(即领域)，因而也存在不同阶层，进而自然可以认为“地方自身也会流动”，从而最终补上缺失的一环。其中，中国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城市的结构体系与领域范围，涉及不同城市间的角力。城市领域的变迁深刻扰动着本地居民的情感，并重构城市的人地关系，影响至今。于此，以广州市为案例，从城市的垂直流动之视角重新审视其再领域化过程，期望能更深入理解一种地方自身的流动，以及流动性之于“地”的意义。

1 流动性与人地关系

受到20世纪90年代时空压缩对地理邻接的挑战[3]，流空间(space of flow)重塑了城市的状态，使全球不同的地方城市均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与趋势。而地方城市要实现全球化，则需依托于人的流动性(mobility)。人的身体作为知识、技术和文化等的物质载体，当其跨越边界后将会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发生连结。这种人的流动将会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或是人地关系，譬如“外来人—本地人”和“外来餐厅—本地食客[5]等。由于人在流动中背驮着原地方的生活经验，在新地方中将出现社会身份重构的现象——除非能够形成规模效应，否则外来移民将沦为新地方中的弱势群体。本地居民会建构出特定话语来实现对我者空间的垄断与对外来群体的排斥，以维护自身在空间中的权威，亦即是大卫·西布利(David Sibley)所提出的排他空间(spaces of exclusion)[6]，外显为在同一空间之中不同地方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城市的地方性看似被这种世界主义的力量所不断掩盖与消磨：城市景观变得越来越相似，城市文化变得越来越多样。虽然对“全球化城市”的标准莫衷一是，但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多元、开放、共存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文化并非被动地接受全球文化的洗礼，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全球文化被认为充斥着“入侵者”或“殖民者”的隐喻。这种“地方—全球”的冲突容易形成狭隘的地方认同，马西(Doreen Massey)曾论述“进步的地方感”[7]并对此展开批判。

可见，在流空间背景下，人的流动使人重构身份，进而出现族裔矛盾与地方认同等问题。这种“移民—地方”关系的研究契合了后结构主义中对人的主体性回归的重视。然而“地方”并不仅仅是作为人在流动之中的“码头”或是流动性的空间容器，“地”本身也在流动之中。在人的流动之中，地是作为参照物的存在：流动中的人参照不同的生活空间，便完成了身份上从“本地人”到“移民”的转变。类似地，在地的流动之中，人是作为参照物的存在：将人视为相对静止状态的参照物，宗主地和飞地则是景观、语言和节庆等几乎完全相同的地方[8]——从这一角度而言，飞地是宗主地在空间上流动的结果。

上述的人和地的流动，均是着眼于物理空间相对位置发生改变的流动模式，是一种水平流动。然而，流动性的议题还可以在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下再解读。社会学把社会流动划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与代际流动等，而其中的垂直流动是通过职业或收入等变量划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探讨不同群体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变化[9]。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教育资本理论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资本理论都揭示了社会阶层的形成过程和人在其中的阶层流动。除了关注某一时代的整体社会垂直流动之外，这种理论也逐渐被移民研究学者所关注：对于人的流动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水平的流动研究，也开始关注人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地方融入之间的错位和所导致的垂直流动[4,10]。移民的地方融入顺利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新生活空间的社会阶层地位。而生活的地方空间作为一个场景式的参照物，亦可以成为度量人的垂直流动的标尺。

而对于地而言，同样也存在垂直流动的状态。不同的权力在空间里运作将会产生城市之间的“阶层”，如各国的行政区划管理，实际上划分出一套城市之间的阶层；城市内部的主城范围区划，实际上也划分出城市内部具有差异性的空间阶层。城市在这种再领域化的过程中，通过重构城市的权力体系而实现垂直流动。但这一过程往往仅关注领域内的制度、管治和尺度等话题，城市几近成为了唯一的主角，而城市中的人则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因此要而言之，社会学中垂直流动的研究对象为人，讨论社会不平等的议题[9]；地理学中垂直流动的研究对象为城市聚落等人的生活空间，聚焦空间阶层的变化及其影响等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人与地之间依然存在一种耦合关系：人或地在流动后，都将施加一个影响给予双方。从形式而言，水平流动更倾向是一种外显的跨边界流动，而垂直流动则更倾向是一种内敛的跨阶层流动。2种流动形式的共同作用下重构了人地关系(图1)。

而随着对流动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微观化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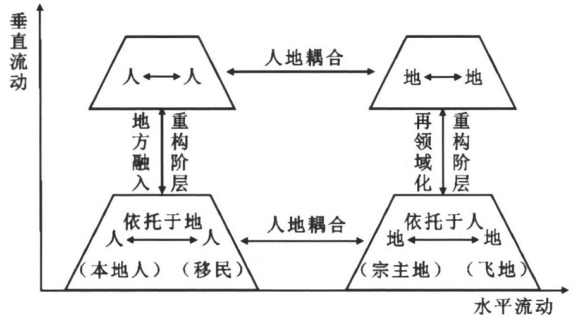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性下的人地关系重构

Fig.1　Reconstruction of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under the theory of mobility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活化的视角日趋重要[4],垂直流动的研究逐渐进入人文地理学者的视野。人地关系的垂直流动涉及地方融入和再领域化的两个过程,因而需关注地理学中地方与领域两个特殊的空间。政治地理学中的领域(territory)与社会文化地理学中的地方(place),都是对“空间”再解释的抽象概念。领域是权力的空间化产物[11],而地方是情感的空间化产物[12]。领域与地方往往是指向同一个空间,并在同一个空间内重叠交织。空间、领域和地方,可以视作是真实的物质的城市3个不同的抽象化术语。

情感需要在沉淀与积累,故作为情感归属的“地方”,往往是相对静止的,而人则是在地方之间游走、邂逅与别离,并在不同地方之内的社会阶层中沉浮。对于权力运作的“领域”空间而言,人反而才是静止的主体。城市的层级体系是权力之间的博弈,人在其中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在人或地的阶层垂直流动研究之中,人的垂直流动应更关注外来移民的地方融入,地的垂直流动则应更关注再领域化中的本地居民(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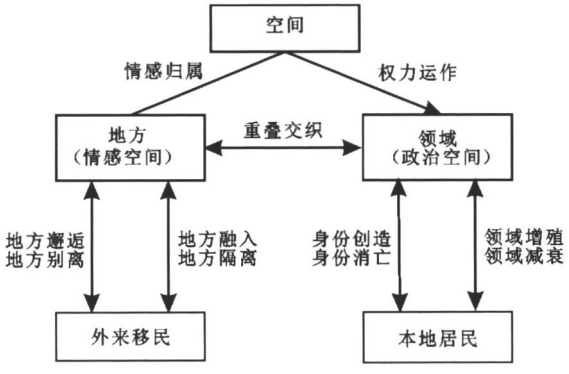

图2 空间、领域、地方与人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territory, place and human

简而言之,流动可分为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在微观化和生活化的视角下,阶层间的垂直流动研究日趋重要。人的垂直流动是一种地方融入的过程,而地方是情感归属的空间,往往相对静止,故需关注“外来移民-地方空间”的关系;地的垂直流动是一种再领域化的过程,而领域是权力运作的空间,往往相对主动,故需关注“本地居民—领域空间”的关系。然而,相比较于“移民—地方”的研究,“原民—领域”之间的互动与耦合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于此,本文从再领域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广州市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分析其中的本地居民身份政治议题,以期探讨在地的垂直流动背景中人地关系的重构过程。

2 再领域化中的城市研究

领域是权力关系和社会过程的产物[13]。领域化,是指对某一空间有目的地进行划定、建构和赋予权力的过程,行政区划、学位片区、经济特区等均可看作是领域化的结果[14]。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对“空间”的再思考,“领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政治地理学学者更是钟情于此。自90年代始,领域化的研究开始浮现:如Malkki认为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是领域化的形式之一,并比较知识分子和贫困难民两者之间的国家认同差异[15];Steinberg则借助反城市规划的社会运动来关注城市中边缘领域的形成过程[16]等。近年来,领域化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包括生态保护区与居民生计、生活和生产之间的冲突[17,18],选区内部多样性与政党制度领域化[19],泰国北部的中国遗民在领域化中的职业变化[20]等,此外亦拓展出反领域化(counter-territorialization)[21]新研究内容。

国内对于领域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内容多为剖析城市(再)领域化的具体过程,对于人在城市领域化过程中的情感变迁还未完全探讨,且研究案例地往往集中在城市:如大都市行政区划重组的不完全再领域化[22],乡村城市化中的领域化过程[23],“单位”和“社区”作为城市基层地域管治基本单元中的领域政治[14],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与城中村地域化[24]等。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充斥着权力变迁,传统乡村的地理空间被城市重新解构,因而城市一直是领域化研究中的重地。由于国内城市化过程中受到经济、制度和政策等诸要素的共同影响,从而导致领域化的具体表现也无法以一概全,表现出诸多与西方研究实证的不同之处。与西方国家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不完全一致,中国的城市化存在3种模式,分别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外力推动[25]。这3种模式,实质上亦指向了3种城市(再)领域化的过程。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往往是行政主导型——通过建设都会城市成为行政中心,从行政上重新调整了城市的区域服务能力,由此形成区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权力中心，并嵌套在一定的城市层级体系之内。这种建设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行政区划变更过程，从而导致各原领域之间摩擦不断。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则主要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市场经济改变了乡村的生产方式，乡村的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模式也随之变化，进而实现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重新定义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解构了乡村传统的宗族领域。外力推动的城市化则是因为外向型经济的推动而出现——无论是外资、边贸还是旅游，都是在外力推动下促进了该地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的新城市。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会建设经济特区或技术开发区，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这些“经济飞地”的本质就是一种领域化的过程；边贸城市的居民则每日往来于两国之间，边界的权力被逐渐消解，边境城市的崛起是对国界的再领域化，权力空间从国界让渡到城市；旅游开发是一个领域化的过程，通过商业化的系列操作，旅游开发公司再领域化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流通。

改革开放后，为发展区域经济、壮大中心城市，实现“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的经济改革，中国从198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撤县设市的行政区域改制政策——即把县郊划归附近的中心城市管辖，由此落成一批县级市[26]。通过打破行政边界的发展壁垒，实现人口城市化[27]，各经济社会要素在中心城区和县郊地区之间的愈加频繁流动，城市的整体发展与日俱进。然而，这种通过行政区划的城市化仅仅是城市之间的“兼并重组”，生活在该城市之中的居民是被动参与进来。县改市的实质是一种“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的空间实践：旧县郊的一切都被逐渐更新为新城市的一部分——县郊的行政边界被抹去(去领域化)，县级建制逐渐转变为市区建制(再领域化)[22]。通过系列的利益相关者博弈，新城政府嵌入进去旧县政府的行政实权，并将其纳入发展规划中重新布局，由此完成了“大型城市—经济中心”的转变。在此间过程，县郊居民虽然没有任何物理空间上的移动，但却被动卷入“流动性”的洪流之中——县郊的“身份”通过再领域化的过程变成城区，从边缘区变成半边缘区；县城居民熟悉的生活空间发生主动流变，并由此被动冠以新的主体身份。换言之，县郊再领域化的过程，使县郊本身与该地居民均发生了身份重构的现象。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广州撤县设区的历程

自1983年起，广州开始了撤县设市与撤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在广州现行11个行政区中，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番禺区和南沙区均是由撤县设市及再划分而来。1960年，原属于佛山专区的花县、从化县划归广州市。1975年，把原属佛山地区的番禺县和惠阳地区的增城县划归广州市。1992–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依次撤销番禺县、花县、增城县和从化县，分别设市，均为县级建制。2000年，番禺和花都撤市设区；2005年，南沙从番禺中划出；2014年，从化和增城撤市设区。

自广州建城以来，其城市管辖范围一直处于不断扩大之中。城市发展至明清时期，其范围一直在如今越秀区内，即后文所提及的“老城广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加强了行政区划的合并，以便于管理，于此背景下，1983年后“广州”的面积达到最大，1988年后确定了如今的城市范围，这些合并进来的县城即“四乡广州”。从城市发展历史的角度，广州可分为3部分：老城区域、郊区区域和四乡区域(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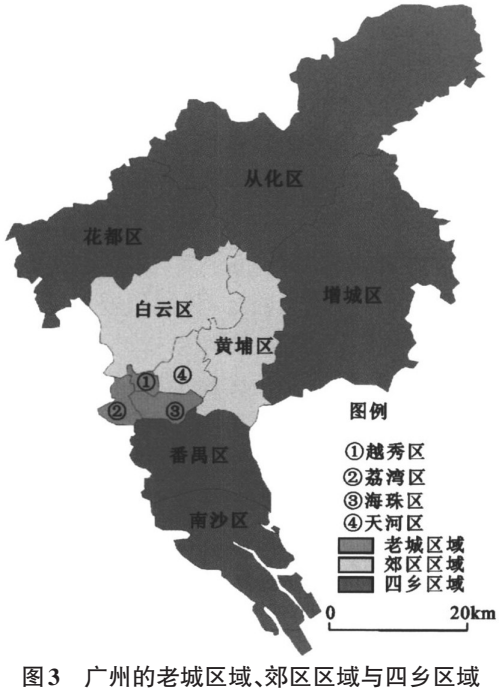

图3　广州的老城区域、郊区区域与四乡区域
Fig.3　Guangzhou´s old town, suburban and outer suburb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老城即是越秀区、荔湾区和海珠区，郊区即黄埔区、白云区和天河区，四乡区域是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番禺区和南沙区。其中，老城区域和天河区的城市化率已达100%。虽然如今的天河区发展较快，但因其发展历史极短，1985年才正式从郊区中划出成市辖区，与老城区域的联系不深，因此依然将其划入郊区区域。

3.2 研究方法

本文遵循建构主义的本体论，采用定性方法中的文献资料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来搜集广州市撤县设区的相关档案及数据。

(1)在2018年3-5月期间，多次前往广州市地方志馆与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查阅广州市志及区县志，重点查阅广州自秦朝建城以来的行政区域位置变迁考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的行政区划变迁史。

(2)在2018年3-9月期间，对广州市市民进行目的性抽样，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抽样时主要考虑样本的年龄、在广州的居住区域和居住时间等主要因素。每次访谈时间在60-90min之间，访谈形式均为单独访谈。共有34位受访者，其中男性16位，女性18位；年龄介于20-70岁之间；其中8人有本科学历，其余均仅完成中学或小学教育；所有受访者均在广州出生、学习和生活，母语均为广府话。受访者的生活区域涵盖广州现时的11个行政区，各区受访人数在3-4人。访谈问题主要围绕受访者的地方认知与身份认同：①对“广州”空间范围的地方认知；②对“广州人”的身份认同与群体界定；③对广州变化的记忆与感受。在结束访谈后，对访谈信息进行整理并转录。

4 再领域化中居民的身份政治

4.1 排他的策略：顽强坚守县城的旧领域

由于地居偏远，与曾经的省城地区(即老城区域，自明清以来一直作为广东省省城)交流有限，四乡居民普遍难以认同自己是“广州人”，对于“广州”的认同感也极低。囿于曾经的行政区划，他们认为“广州”是遥不可及的，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坐车要三个钟才能到的地方”；“广州”是一个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与自己周边的乡村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广州”发展得再好也与自己无关，毕竟发达的地区依然还是那一片；“广州人”永远是趾高气扬的，从不把自己当作是同一城的人。这种内部相对封闭、孤立与稳定的环境下形成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排他策略(exclusionary strategy)[11]。此外，媒体对地理知识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特定地方的刻板印象的形成[28]。四乡居民提到媒体中不断传播“广州”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形象，注重宣传市区的地标景观，造成他们巨大的情感落差，这种失落感给他们与其想象中的“广州”划出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总觉得平时看到的那个繁华‘广州’距离我们太远啦。……身边的人都是讲‘去广州’，例如：‘去广州玩啊?在广州上班吗?’所以慢慢地，我也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广州人。”——从化区(2018C31)

四乡区域合并进广州已长达50余年，在经济上日趋相互交融之势，但在交通和教育上却依然存在“老城”与“四乡”之间的区别。如在2013年改革之前，广州的中考是实行分区招生的政策，绝大部分的初中生都只能留在其初中所在的行政区内上高中，然而越秀、荔湾和海珠是并称“老三区”，不受该政策的限制。像这种老城区的政策制度与其他行政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最终导致了“老城”与“四乡”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出隔阂加深的状况。

“我的长辈都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也觉得自己是番禺人。……觉得番禺以北的地区才叫作广州。……番禺一直作为一个县城，即使并入广州后独立性都好大，例如我们的公交系统，都以‘番’字开头独立命名。所以我觉得行政这方面的影响还是好大。……我觉得融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吧。”——南沙区(2018N31)

在撤县设市的问题上，四乡本地居民在情感上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他们依然难以面对自身熟悉的环境被彻底改变了归属。城市在垂直流动中的阶层下沉，让四乡居民的排他策略更加保守与偏激。老一辈的四乡人不断言传身教地向新一代的四乡人展示四乡与老城之间的区别，通过话语建构不断恢复出四乡的固有领域，使其对“广州”产生一种他者的价值取向。

“我们有一句话从小唱到大：‘广州亲戚，又食又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拎;广州朋友,无好过有。'"——番禺区(2018P32)

最终,"广州"和"广州人"被刻板印象为具有破坏性和侵略性的标签——即便是与四乡居民具有亲密关系的亲戚与朋友,被烙上地域的印记后也难以幸免于这一排他策略。

4.2 双重的市籍:部分接受广州的新领域

并入广州后,在统一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城市化给四乡居民带来明显的收益,四乡居民也逐渐认同并协商于"广州人"这一身份。

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中,交通设施对于地理距离的影响最大。自2006年广州地铁3号线贯通至番禺,先后陆续规划修建到南沙(4号线)、花都(9号线)、增城(13号线)和从化(14号线)的地铁。此外,花都、番禺和南沙等原先独立营运的区内公交车,通过政策上的统一来加强与市区的联系,如实行特殊群体优惠乘车和推行"友爱在车厢"的活动等。四乡居民通过接驳公交进入市区,不再是只能依靠市内客运大巴,进一步缩短老城和四乡之间的空间距离。另外,广州市的机场修建在花都区,直接带动了市区与花都区之间必须配套的机场高速公路落地,大量的楼盘巴士亦每日穿梭于市区和花都之间。根据《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29],广州将继续在增城和南沙修建机场。可以预见,增城与南沙将有更多的公路通往市区,便于提高市区与四乡之间的交通通达性。交通线路作为流动的物质载体,其发展不断消磨四乡与老城2个领域之间的隔阂。面对基础建设日渐完备的四乡居民,在情感上表现出与"广州"的亲昵。他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可以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尤其是经济效益——由于四乡与市区的交通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选择居住在四乡,工作在市区,以便获得在广州较低的进入成本。这种外来移民的行为选择,直接为四乡居民带来出租房屋的经济收入。

"广州的地铁修到我们这,进出方便了很多。有了地铁我就可以经常拿汤去我女儿的出租房,终于有点广州人生活的感觉。"——增城区(2018H33)

"我们还是很喜欢做广州人的,因为有钱啊,多了人进来这里租屋。有些亲戚,在清远的,都很羡慕我们,因为他们的房子没人去租,有价无市。"——花都区(2018H32)

对于四乡居民而言,"广州"是一个从空间距离到社会距离都极远的地方。四乡居民面对广州对县城的再领域化,初期会产生抵抗力量,坚守排他策略,并非简单地接受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而面对再领域化带来的预期收益,亦开始犹豫是否必须坚持原来的身份,日渐协商于"广州人"这一新身份。再领域化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使其身份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形成了双重"市"籍的纠缠状态。

"看情况,同在广州会说自己是番禺人,出市以后会说自己是广州人。"——番禺区(2018P33)

四乡居民面对广州本地居民,往往仍会强调自己原有的领域身份,以表达对广州的不满;但面对不熟悉广州的人,对行政区划尺度的执着得不到积极回应而变得意义尽失。四乡居民的矛盾心理主要表现在对于"广州人"身份的挪用与协商,但同时又不甘心处于从属地位。

4.3 遮掩的抵抗:再领域化中的居民身份政治

广州自民国时期始与周边县城分合数次,2000年以来始对市内撤县设区,增强对各县城的行政区划治理。在合并县城时,番禺县遇到的阻力最大,从上而下都有极大的反对声音。

蒋隽[30]在2013年6月18日《信息时报》中《番禺撤县设市》提到:"近代以来,现广州市辖之天河区、海珠区、白云区、南沙区的全部及越秀区、黄埔区的大部分范围均从原番禺分出来,今日番禺(区)较之原番禺(县)则辖区大为缩小。……民间反对声音主要为不想番禺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而公务员反对声音主要为担心工资下调,因当时番禺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远在广州公务员之上。当时的番禺政府曾组织专家学者从文化、历史、经济等各方面论证撤市设区不适合番禺,番禺人大代表于1999年广州市人大会议联名向大会提交《关于撤市改区后对番禺产生严重影响应慎重考虑的议案》。"

从番禺县到番禺区,番禺在垂直流动中,阶层下沉为广州的一部分。这种地的流动是番禺(我者)的领域减衰,广州(他者)的领域增殖;对于当地居民的身份政治而言,是番禺人的身份消亡,是广州人的身份创造。在"番禺市"内,番禺本地居民的集聚和坚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守,使该处成为了一个抵抗空间(space of resistance)[31]。这种抵抗空间并非由于少数群体在空间集聚而成,而是由于再领域化背景下,原先属于“番禺市”的多数群体,在身份政治的转换中迅速变成了“广州市”的少数群体。而这种转变仅仅发生在四乡区域,对于老城区域和郊区区域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影响。番禺本地居民需要被迫接受广州的身份同化,形成新的双重身份混合形式,但是老城本地居民却并无四乡对其身份重构的懊恼。这种单向的身份同化过程无疑也加剧了番禺本地居民的不满与抵抗情绪。

再领域化使番禺成为了一个流变的城市,重塑了番禺的人地关系。自合并以来,此间番禺本地居民对广州政府一直存在着遮掩的抵抗:一方面,番禺本地居民怀念着曾经在独立自主,坚守着深厚的本土文化,至今尚未完全将辖区里所有的管理与广州政府统一对接;另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合并后带来的区域地位提升与基础设施完善,尤其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来,若干个项目在番禺区内落地。番禺本地居民感受到失权的“番禺市”,与广州政府管理下的“广州市”构成一个支配与对抗、限制与冲击的权力关系。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在流动性背景下分析人地关系的框架,并且指出地的垂直流动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进而在广州市撤县设区这一背景下,对“原民(人)—领域(地)”关系重构开展案例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空间的流动可以分为物理空间上的水平流动和社会空间上的垂直流动。“人”和“地”均存在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2种形态。②撤县设区是再领域化的过程。行政区划的结果是形成了不同城市之间或城市内部之间的分层,而撤县设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重塑了不同城市之间的行政级别,亦即是实现了这批城市的阶层的垂直流动。③再领域化重塑了本地居民的身份政治,即是地的垂直流动中人地关系重构。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中,本地居民的身份亦随之改变:旧领域的多数群体在再领域化后变成了新领域的少数群体。由于本地居民并没有离开其生活空间,故旧领域往往成为了新领域中的一个抵抗空间,重构出新的人地关系。

作为中国空间治理中重要的一个社会变迁过程,撤县设区重塑了大量城市的阶层,尤其是部分大都市为谋求生存发展空间而不断合并附近的县城。长久以来,“城市阶层”的提法仅被作为“城市中人的社会阶层”的简称。尽管常常有城市之间的排名与比较,即城市之间的阶层已经被定量统计分析,但城市如何在这种阶层之间流动,以及这种流动背景下城市中的人地关系如何变迁重构则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这种机械的城市阶层排名,最后只沦落为人在选择生活空间时的一个参考,或者是成为研究全球城市网络空间中选取节点城市的标准。此外,这种城市阶层排名仅仅保留部分经济属性,并未将其嵌在权力运作的框架中讨论与比较。流动性并非简单的扩散运动,而是一个能够产生异质空间的人文地理学议题:地的水平流动则在空间中形成了少数人群聚集的族裔飞地,垂直流动则在阶层中形成了少数人群抵抗的纯化社区。异质空间的出现使得该城市社会文化呈现出更复杂与更综合的空间关系,摆脱了简单而刻板的文化区划及文化扩散的视阈。这种异质空间瓦解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空间,并带来不稳定和去边界的社会特征。

“流动”是一个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议题。既有经济学这般专门研究资产等物的流动,也有社会学这般专门研究社会中的人的流动。而对于地理学而言,空间可以被视为一个行动者,进而讨论空间的流动。空间一直被视为人们生活中的“背景幕”,然而空间自身也具有能动性,一直在流变之中。尽管已有的研究呼吁不能简单地把空间视为一个容器,但对空间本身的社会化研究依然不足,并未能讨论空间自身的流动及其影响。流动即是跨越边界,空间的垂直流动,本质就是跨越城市体系的阶层边界。流动性是当下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转向之一,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研究范式,打破了以往对于地理空间是固定静止的认知。最初的流动性研究是从地的流动开始的,亦即是交通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下带来地与地之间的连结与交流日益加深。而后这种社会变化的发展越发迅猛,在如今的时代背景,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再是一个稳定静止的空间,而是内部各要素均发生强烈地流动。在大都市市区之中,传统的人地关系早已受到全球资本与全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球文化的冲击。为了减轻移民的地方隔离与景观的分崩湮灭，要求市区居民面对生活环境剧变时，必须将个人情感抛弃，但这一观点难免是过于理性无情。此外，在郊区之中，传统的人地关系常常受到城市化及领域化的挑战，这种过程又被当地居民视作带有侵略性的隐喻。可见，流动性已然改变了人看待地的传统视角，进而重塑了人地关系。

致谢：调研过程中得到广州市民和广州旧城关注组、广州番禺乡下台、广州旧闻等自媒体的帮助，向他们表示感谢。也感谢科罗拉多大学玻尔德分校的梁邦兴博士生和华南师范大学的王敏副教授在本文构思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Bethlehem D. The end of geograph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law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4, 25(1): 9-24.

[2]Buckle C.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oving home[J/OL]. Geography Compass, 2017, 11: e12314. https://doi.org/10.1111/gec3.12314.

[3]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gress [M].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89.

[4]朱竑，张博，马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议题与展望[J].地理科学，2019，39(1)：1-11.

[5]曾国军，孙树芝，朱竑，等.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基于广州的案例[J].地理科学，2013，33(3)：291-298.

[6]David Sibley.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M]. London, UK: Routledge, 1995.

[7]钱俊希，钱丽芸，朱竑."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J].人文地理，2011，26(6)：40-44.

[8]姚丹燕，刘云刚.从域外领土到飞地社区：人文地理学中的飞地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9，34(1)：20-27.

[9]刘祖云.论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及其社会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1991(2)：48-53.

[10]Maja Cederberg. Social clas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emale migrants' narrative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atus[J]. Migration Studies, 2017, 5(2): 149-167.

[11]刘云刚，叶清露，许晓霞.空间、权力与领域：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5，30(3)：1-6.

[12]周尚意，唐顺英，戴俊骋."地方"概念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意义的辨识[J].人文地理，2011，26(6):10-13+9.

[13]刘云刚，王丰龙.政治地理学中的领域概念辨析[J].人文地理，2019，34(1):14-19.

[14]刘云刚，叶清露.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领域化与领域政治——基于东莞东泰社区的案例研究[J].地理学报，2015，70(2)：283-296.

[15]Liisa Malkki.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2, 7: 24-44.

[16]Philip E. Steinberg. Territorial formation on the margin: Urban anti-planning in Brooklyn[J]. Political Geography, 1994, 13(5): 461-476.

[17]Justin Raycraft. Circumscribing communities: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territorialization in southeastern Tanzania[J]. Geoforum, 2019, 100: 128-143.

[18]Salvatore Paolo De Rosa. 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waste wars´ in Campania (Italy): Competing territorialisations and socio-environmental conflict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8, 67: 46-55.

[19]Carolina de Miguel. The role of electoral geography in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party systems[J]. Electoral Studies, 2017, 47: 67-83.

[20]Po-Yi Hung, Ian G. Baird. From soldiers to farmer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Kuomintang territorializ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7, 58: 1-13.

[21]Patrick T. Hurley, Yilmaz Ari. Saying "no" to (the) oxygen capital? Amenity migration, counter-territorialization, and uneven rural landscape change in the Kaz Daglari (Ida Mountains) of western Turke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62: 195-208.

[22]罗小龙，殷洁，田冬.不完全的再领域化与大都市区行政区划重组——以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0，29(10)：1746-1756.

[23]刘云刚，仵明霞.领域化视角下的珠三角乡村城市化再思考——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例[J].地理科学，2016，36(12)：1834-1842.

[24]Liang Xiaowei, Yuan Qifeng, Tan Xiaohong et al. Territorialization of urban villages in China: The case of Guangzhou[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8, 78: 41-50.

[25]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6]范琦娟.时间轴上的"撤县设市"[J].决策，2017(Z1)：20-23.

[27]唐为，王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5，50(9)：72-85.

[28]安宁，朱竑."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J].地理学报，2015，70(10)：1650-1663.

[29]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小组办公室.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草案[R].广州：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18.

[30]蒋隽.番禺撤县设市[N].信息时报，2013-06-18.

[31]Paul Knox, Steven Pinch.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6th edition)[M]. Harlow, UK: Prentice Hall, 2009.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